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
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
文库

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

罗振亚 著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

罗振亚 著
导师 龙泉明
审稿 李茂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罗振亚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6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ISBN 7-5004-5090-7

I. 朦… II. 罗… III. 朦胧诗—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 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6811 号

责任编辑 李 是

责任校对 韩天炜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010-64031534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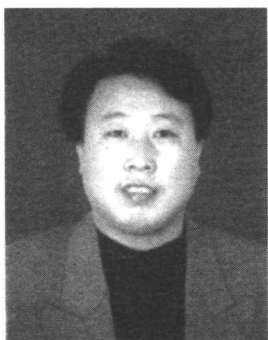
印 张 11.375

插 页 2

字 数 281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罗振亚 男,1963年生,黑龙江讷河人。1983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1988年于山东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3年于武汉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省级重点学科后备学术带头人、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兼任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出版专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北方文艺版,1993)、《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版,1997)、《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社会科学文献版,2002)、《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透视》(黑龙江教育版,2002)、《雪夜风灯:李琦论》(黑龙江人民版,2001)等五种,在《新华文摘》、《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诗探索》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2004年被评为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曾获黑龙江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黑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奖励。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中国新诗的断代研究，主要描述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的发展流变过程，探讨朦胧诗后先锋诗歌各抒情群落之间的承续与变异，以及每一时段的不同特征，揭示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的演变规律与历史地位。本书的基本观点：朦胧诗后先锋诗歌具有反叛性、实验性、边缘性的艺术特质，它曾荣光一时，且前景广阔。“第三代”诗歌的生命本体喧哗是新诗意味革命，事态结构带来了新诗抒情策略的转移。海子及其死亡是先锋诗歌命运的隐喻，他是“第三代”诗歌的终结者与“个人化写作”的开启人。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诗歌呈现着断裂、转型、论争和分化的轨迹，崇尚“个人化写作”，“民间立场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两股力量都致力于“叙事诗学”建构。’70后诗歌在“说什么”问题上有所拓展，其“荷尔蒙叙述”和原创的快乐文本创造，提供了新的写作可能性。女性主义诗歌20世纪80年代以“躯体诗学”解构传统，找到了“自己的屋子”，90年代激情同技术遇合的新向度选择得失互见。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铁映

副 主 任：汝 信 江蓝生 陈佳贵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洛林 王家福 王缉思

冯广裕 任继愈 江蓝生

汝 信 刘庆柱 刘树成

李茂生 李铁映 杨 义

何秉孟 邹东涛 余永定

沈家煊 张树相 陈佳贵

陈祖武 武 寅 郝时远

信春鹰 黄宝生 黄浩涛

总 编 辑：李茂生

学术秘书：冯广裕

黑龙江省教育厅骨干教师资助项目
哈尔滨师范大学优秀学术著作

总 序

在胡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已持续了12年。这12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很有意义。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科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支持文库的出版。新旧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胡绳同志仙逝,社科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科学者是我们社会科学的未来,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希望包括博士在内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密切关

注、深入研究 21 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离开了时代性,脱离了社会潮流,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就要受到影响。我是鼓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这是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名呢?名,就是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如果没有得到社会、人民的承认,他的价值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价值就在于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一旦回答了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你也因此而实现了你的价值。在这方面年轻的博士有很大的优势: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但青年学者要多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博士尤其要很好地向导师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发挥自己的优势,研究重大问题,就有可能出好的成果,实现自己的价值。过去 12 年入选文库的论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什么是当前时代的重大问题呢?纵观当今世界,无外乎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理论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两大制度的基本看法。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都有很多的研究和论述;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也有过很多研究和论述。面对这些众说纷纭的思潮和学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从基本倾向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治家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当然要向世界、向社会讲清楚,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定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能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全面的振兴。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自己的理

论来解决,让外国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也许有的同志会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但是,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中国化了以后才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是不行的,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什么教条都不行。把学问、理论当教条,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在 21 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仍然是两大制度问题:这两大制度的前途、命运如何?资本主义会如何变化?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学者无论是研究资本主义,还是研究社会主义,最终总是要落脚到解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问题。我看中国的未来就是如何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只要能长期稳定,就能长期发展;只要能长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能实现。

什么是 21 世纪的重大理论问题?我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我们的理论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的,决不是相反。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不发展的、僵化的东西都是坚持不住的,也不可能坚持住。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随着实践,随着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也没有包揽一切答案。它所提供给我们的,更多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是立场,是方法。我们必须学会运用科学的

世界观来认识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年轻的社会科学博士们要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在这方面多出精品力作。我们将优先出版这种成果。

李锐

2001年8月8日于北戴河

序 一

陆耀东

这篇序，本应由龙泉明君来执笔最合适，因为：第一，龙君是罗振亚君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导师，罗君的这本博士学位论文是在他的指导下写成的；第二，龙君对朦胧诗后先锋诗歌深有研究，他曾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将复杂难解的先锋诗及其理论，论说得相当清晰。不幸，日前龙君壮年病逝。罗君和我刚刚同样遭遇了这一巨大悲痛的袭击，他是弟子送导师，我则是师送弟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更多一重悲痛。当罗君在他的论文即将正式出版嘱我写几句话时，我觉得责无旁贷，中断了手头的工作，来说我较为生疏的话题。

对诗和诗学，我的研究近二十年并未中断过，但愈研究疑虑愈多，有的甚至回到了零（起）点。例如社团、流派与诗人独创性的关系；流派的演变；不同流派之间的汲纳与拒斥；先锋与非先锋乃至传统的同与异等。有些在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是毋庸置疑的常识，我却觉得大有再研究的必要。^①所以，一方面我并不

^① 如所谓“九叶派”是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图简便随意取的，毛病百出。在1981年以前，任何人的文字中无“九叶派”字样。在《中国新诗》上发表论著的35人，有两代人，冯至、卞之琳等是师辈；以诗风分，未收入《九叶集》的诗人诗作，如

以为罗君说的都无可争辩；但另一方面，真诚地钦佩他这种敏捷勇敢的思维，即使对朦胧诗后先锋诗歌这种极其复杂的现象，也能快刀斩乱麻，大胆地选定名称，大胆地归纳梳理，大胆地进行论说。

朦胧诗后，诗坛山头林立，且大多昙花一现，各领风骚三五月（？）有人信奉“打倒”万能论，以为打倒别人，打倒别的流派，自己就可万岁；不少人信奉封建规矩，以为天无二主；不少人信奉庸俗化的进化主义，误认愈后起者愈先进，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最落后，现代主义也不前卫，只有后现代主义先进；他们急于忙着发檄文、贴宣言……其实，任何时代任何流派的艺术其生命靠的是作品，是诗的文本，其他东西都不能长久地起大作用，非学理的意气之争，包括“文字仗”和“口水仗”，都无意义。诗界的非主流或自称民间的诗派害怕被冷落、被淹没、被扼杀，奋起力“争”，奋起“炒作”。但这作用有限，一是时间上有限，一是影响力大小有限。如果作品艺术水平不很高，“争”、“炒作”，挂金字招牌，发堂皇宣言，贴讨伐檄文，都是白费心思，无效劳动。20世纪50年代后期吹捧《红旗歌谣》，80年代不同人从两个方面万炮齐轰朦胧诗，是两个明证，前者数以万计人的赞歌也未能给它增加什么；后者不管人们如何评说，中国诗史上有朦胧诗光彩的一页，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在诗的历史长途上，任何一种诗都只是一个“驿站”，不能百年不变，千年不变，万年不变。“创新”是诗的生命线。杰出的诗人对前人不顶礼膜拜，即使是佳构，也不奉为仿效的神圣经

（接上页注）

方敬、李瑛、马逢华、杨禾、方宇晨、羊翠、鲁岗、孙落、南纓的诗，与《九叶集》都有相近之处，唐湜先生说：“他们都应该与我们九人一样的成员，其中有几位，如方宇晨，诗的现代风格浓郁得近于穆旦。”我以为用“九叶派”来指称《中国新诗》作者群或40年代现代派，不妥。

典；总是不断突破旧的规范；新的规范形成之日，往往又是它解构之时。

诗歌既以“创新”为生命线，诗人进行各种尝试，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些看似对立的东西，如痴狂抒情（热态）与零度抒情（冷态）、温度抒情（不冷不热），历史上都已有有人试验过，并非怪事。民间化与贵族化，各有所长。诗不必分主流、非主流，因为它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多样化、百花齐放，这包括题材、思想、感情、构思、语言、形式、风格，而不只是艺术形式。

近三十年来我主要研究新时期以前的新诗，极少谈及目前诗坛的新成就和新问题，未卷入争论漩涡，比较清静，聊以自慰。但罗振亚君的书，涉及的是尚未成为“历史”的现象，而且评价分明，恐招驳论。如书中涉猎的“下半身写作”的“诗”，已经出现了偏向，有的确实无聊，甚至“黄”，但也不可以以“黄”的名义抹煞一切。我不会忘记，幼年时亲见的寡妇与人“私通”被族长下令“沉塘”^①；也不会忘记世界诗歌史上的某些冤案，如法国象征派前驱波特莱尔的《恶之花》，被法院认为有伤风化，受到制裁；美国的大诗人惠特曼因《草叶集》中的爱情诗被司法部长判为不健康而被解职，波士顿地方检查官还以淫猥罪名禁止《草叶集》发行。但是“下半身写作”的诗中，确也有如本书所举的例子《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赤裸地以造爱、性交的舒服快乐为最高原则和目的”，展览做爱过程、姿态和“舒服”，没有含蓄，没有美，也没有理性，没有文明人的观念，自然更没有最起码的道德意识。罗君对它的评说比较辩证，比较客观。罗振亚君和我的意见，如果招致两个方面的非议，那是意料之中的事。

罗君的书，宏观论说自成一家，正如作者在原毕业论文的《中文摘要》中所说：

① 人被绑在捆着巨石的梯子上，抛进深水池塘里。

作为中国新诗的断代研究，本文主要描述“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的发展流变过程，探讨“第三代”诗歌、海子诗歌、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70后诗人的创作和女性主义诗歌各抒情群落之间的承续与变异，以及每一时段的不同特征，揭示“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的演变规律与历史地位。

研究者对此已尽力而为，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时的新诗，有认真的艺术探求者，也有玩诗的游戏艺人；有严谨的学理辩论，也有任性的意气之争。罗振亚君略游戏、意气，重诗本体和学理，剖析犀利，感悟敏锐，把捉诗美精细，行文也美，读来仿佛是一种艺术享受。如果要吹毛求疵的话，我以为是：罗君有时对一首诗只作了一种理解、一种解读。实际上，多数名篇杰作含有多种内蕴，多重诗意诗美。为了节省篇幅，论者不必每篇如此行文，但措辞上应有弹性，留有余地。不知罗君和读者以为然否。

序 二

吕家乡

在阅读罗振亚的《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这部书稿的时候，我的案头还摆着两摞参考书，一摞是先锋主义诗歌集，另一摞是有关先锋主义诗歌研究的论著。这些诗集和论著，有我读过的，也有我没有读过的。我随时查阅他所提到的诗作，查阅其他学者们对于他所考察的同一诗人、同一诗歌群体或同一诗坛现象的论述，相互比较。我发现，振亚的著作固然吸取了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来自他对大量第一手资料亲自独立钻研的心得。因此书中有不少发人之所未发、甚至力排众议之处，即使是和别人相同的看法（较大者如先锋诗歌的反叛性、实验性，较小者如女性主义诗歌由 80 年代的躯体诗学向 90 年代的审美新向度的演变），也有他自己的表述方式。就我的阅读和了解范围，像这样全面系统地研究近 20 年来“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的流变过程的论著，还属于拓荒或尝试之作。

我接触这类诗歌是从 1986 年 10 月《深圳青年报》推出的“中国诗坛 1986 现代诗群体大展”开始的，乍读真是目眩神迷：这是诗吗？为什么会冒出这么多古怪的所谓诗歌和诗学观念？我困惑而且摇头，当时常拿娄方《印象》里的两句诗作为嘲笑的例子：“把流出的泪水咽进肚子里/ 在厕所里尽量把屁放响”。不料

两三年后我就有了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竟不由的借这两句诗来宣泄胸中的郁闷。由此我开始对先锋诗歌有了一点亲近。这几年断断续续地读了一些这类作品和相关的评论，印象是零碎的。这一次通过阅读振亚的新著，补了一课。

这本书具有史论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当代文学只可作批评，不宜作史的研究，因为要拉开较远的时间距离才可以做出准确的历史定位。我倒同意美国学者韦勒克和沃伦的看法：对当代文学作同步研究利大于弊，最有利的是可以方便地真切了解研究对象。再者，当代文学实际上已经在参与和调整文学史的构成。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者密不可分。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正面例证。

我于1980年以走出“另册”的公民资格调入大学，奉命研究新诗史，逐渐明确地给自己定下了如下准则：把诗歌当作诗歌来研究，把诗人当作诗人来研究，把诗歌流派当作诗歌流派来研究，把诗歌史当作诗歌史来研究。无奈力不从心，至今只写了几篇浅薄的诗人论和流派论，新诗史一直未敢动笔。我高兴地看到振亚的新著透露着和我同样的追求。

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是“从细微处见精神”的，因此诗歌的宏观研究一定要以微观研究为前提，微观研究又要以细致入微的鉴赏为前提。振亚正是这样做的。此书所列举的诗作百余篇，评点或褒或贬，或详或略，大都贴切中肯，而且是立足于诗学的。只要看一看他对海子的7部“大诗”（尤其是《弑》）所做的踏踏实实、鞭辟入里的评析，看一看他对女诗人唐亚平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曾经遭到一片道德挞伐）所做的艺术肯定，就可见一斑。

把诗人当作诗人看待，主要的是要弄清诗人审美人格和世俗人格的联系和区别，把握诗人的由价值取向、思维习惯、感情方式、灵感形态等综合而成的创作个性，它的不可混同的特色，它